

很多朋友通过读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等作品,知道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持批判态度的,却不知道,先生在批判的同时,又主张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并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他对汉代画像石及历代碑刻拓本的收藏就是了解历史、汲取营养的方式之一。

鲁迅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过:“汉画像的图案,美妙绝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鲁迅1935年2月4日在给李桦的信中写道:“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

鲁迅的上述评价不是凭空的泛论,而是建立在他对汉代画像石拓本观察的基础之上的。鲁迅一生共收藏汉代画像石拓本700余幅,其中山东340余幅,河南320余幅,其余出自四川、重庆、江苏、甘肃等地。在同时代学人中,拥有他这么多画像石拓本的可能找不到第二个人。

鲁迅最早接触的汉代画像石就来自山东,那不是他有意收藏的,而是他32岁(1913年)那年,友人胡孟乐赠送给他的山东画像石拓本。我们今天计拓本多用“张”,而在鲁迅自己的相关记录里则用“枚”。胡孟乐赠送他的画像石拓本共十枚,都来自山东嘉祥,分别是:洪福寺画像一枚、七日山圣寿寺画像一枚、隋家庄关庙画像一枚、上华林村真武庙画像一枚、吴家庄观音堂画像一枚、郝家庄画像一枚、洪家庙画像一枚、商村画像一枚、无名画像一枚。

仅隔一年,鲁迅先生在考证中国传统绘画中的胡须时,引用的是山东嘉祥武梁祠的画像。他在《坟·说胡须》中写道:“清乾隆中,黄易掘出汉武梁祠石刻画像来,男子胡须多翹上;我们现在所见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凡有胡子的也多翹上,直到元明的画像,则胡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

写完《说胡须》不久,鲁迅从北京琉璃厂购得武梁祠画像并题记拓本等五十一枚,并在《朝花夕拾·后记》中写道:“汉朝人在宫殿和墓前的石室里,多喜欢绘画或雕刻古来帝王、孔子弟子、孝子之类的图。宫殿当然一椽不存了;石室却



鲁迅藏山东汉代画像石拓本,左下角钤“会稽周氏收藏”朱文印。

【史海钩沉】

鲁迅与山东汉代画像石

□杨爱国

偶然还有,而最完全的是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石室。我仿佛记得那上面就刻着老莱子的事。但现在手头上既没有拓本,也没有《金石萃编》,不能查考了;否则,将现时的和约一千八百年前的图画比较起来,也是一种颇有趣味的事。”先生记得没错,武梁祠里确有老莱子的事,他也有拓本,只是当时不在手边而已。

自从32岁得到胡孟乐赠送的十枚山东嘉祥的汉代画像石拓本后,鲁迅对汉代画像石拓本的兴趣与日俱增,并且主动购买拓本。鲁迅对每次购买的拓本都仔细记录。如1915年5月1日从琉璃厂购得武梁祠画像并题记拓本

等五十一枚,这是他购买山东汉代画像石拓本最早的记录。就在一个月,他后来又去了琉璃厂数次,其中四次购买了山东汉代画像石拓本。

有些人知道鲁迅在购买汉代画像石拓本后,主动把拓本寄给或送给他,希望他能买。如1915年10月4日,富华阁送来嘉祥等汉画像拓本一百三十七枚,出土地点分散在嘉祥、汶上、金乡等地,鲁迅认为拓本质量不是很好,但还是买下了。

鲁迅还请人代购山东汉代画像石拓本,对此,他同样有仔细的记录。1916年1月12日,汪书堂为鲁迅代购山东金石保存所藏汉画像十枚,嘉祥画像十枚,汉画像残石二枚。

除了记录自己收藏的汉代画像石拓本,鲁迅还做了编书的准备,拟了《汉画像集》目录,编了汉画像目录、嘉祥杂画像目录、石刻目录、石刻杂件、金石杂件、物调查表抄、各县金石录摘抄等,这些文件都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由这些文件可见先生当年在汉代画像石及古代碑刻上下的功夫是很大的。

虽然在市场上常买到品质较差的拓本,但这并不表明鲁迅对拓本的质量没有高的要求,正相反,他一直对拓本的品质有要求。1934年3月6日,鲁迅在给姚克的信中说:“汉画像模糊的居多,倘是初拓,可比较的清晰,但不易得。我在北平时,曾陆续搜得一大箱,曾拟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传世,而为时间与财力所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机会,还想做一做。汉画像中,有所谓《朱鲋石室画像》者,我看实是晋石,上绘宴会之状,非常生动,与一般汉石不同,但极难得,我有一点而不全,先生倘能遇到,万不可放过也。”6月9日,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五六年

前,所收不可谓少,而颇有拓工不佳者,如《武梁祠画像》,《孝堂山画像》,《朱鲋石室画像》等,虽具有,而不中用;后来出土之拓片,则皆无之,上海又是商场,不可得。兄不知能代我补收否?即一面收新拓,一面则觅旧拓(如上述之三种),虽重出不妨,可选其较精者付印也。”两年后,先生就去世了,印书的愿望虽然落空,但先生对高品质拓本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

对拓本的要求除了品质之外,更重要的是真伪的鉴定,鲁迅也是如此。传统的金石学家对石刻多重视有文字的碑刻和佛教造像题记,对汉代画像石并不是很重视,因此,拓本市场上没有假东西,但自晚清以后,随着嘉祥武氏石室拓本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假货也开始出现了。鲁迅虽然在1913年才开始拥有汉代画像石拓本,但很快就入了道,能够鉴定伪刻了。1916年11月10日,鲁迅从琉璃厂德高斋购得汉画像拓本二种,原为托活洛氏旧藏,上有字,鲁迅鉴定为伪刻。1934年6月18日和1935年5月14日在致台静农的信中都提到翻刻的事,可见直到晚年,鲁迅对伪刻都保持高度警惕。

上述种种与一般收藏家似别无二致,收藏、记录、鉴定、印书,如此之类,并无新奇处。如果仅此而已,鲁迅就不是鲁迅,而是数量众多的收藏家之一。鲁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停留于此,而是有更大的考虑。

这种更大的考虑,除了前文提到的要创作出一种新版画外,还在于把它作为了解历史的新资料。1934年2月11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说:“关于秦代的典章文物,我也荡然无所知……生活状态,则我以为不如看汉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画像》,此像《金石萃编》及《金石索》中皆有复刻,较看拓本为便,汉时习俗,实与秦无大异,循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

鲁迅先生收藏有5100余种历代碑刻、画像拓本,700多种汉代画像石拓本只占其中的七分之一弱,先生对这些拓本都做过一定程度的整理和研究,并且试图由此写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虽然最终都没有完成,但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他对传统文化研究之深。因此,鲁迅提倡的新文化,不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而是要融汇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为一体,开辟一个新世界。



“鸡黍之约”寻源

□康鹏

在金乡县西南部有个鸡黍镇,鸡黍镇在东汉时期称范庄,是东汉大臣范式的故乡。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范式和张劭的“鸡黍之约”而改名为鸡黍。

范式字巨卿,东汉山阳郡金乡人,曾任山阳郡功曹、荆州刺史、庐江太守等职。范式为官清廉,重友情,讲信义,是当时很有威名的大臣,也是古代诚信的典范,在知识分子中有很高的声望。惜字如金的《后汉书》曾用了1000余字的篇幅,记载了范式与汝南张劭诚信相交、杀鸡煮黍以待的历史典故。

据《后汉书·范式传》记载:范式年轻时进京城太学学习期间,与汝南人(今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张劭(字元伯)结为至交。毕业前范式对张劭说,两年后自己将专程从金乡到汝南拜会张劭及家人,并约定了见面的日子。张劭回到家中央求母亲,届时准备好鸡黍酒菜招待范式。张母说:“约定时隔两年,你相信范式真的会来吗?”张劭坚定地回答:“范式是个讲信用的人,决不会失约的。”两年后,范式果然千里迢迢如期赴约。两人开怀畅饮,尽欢而别。

几年后,范式做官至山阳郡功曹(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助理一类的官),而张劭则患了重病,不久就去世了,临终前他以未能见到范式最后一面而深感遗憾。这天晚上,范式在睡梦中梦到了张劭,张劭说自己已死,将于某天下葬。范式惊醒后“悲叹泣下”,禀告太守后,快马加鞭赶往汝南。这边,张劭的家人正张罗着办丧事,可下葬时棺木却怎么也放不进墓穴。张劭的母亲就抚摸着棺木哭着说:“你还有什么心事未了?”这时,就看见范式素车白马,一路号哭而来。范式在张劭的棺材前叩拜行礼,随后,范式拉着棺木上的绳子,棺木稳当地放进了墓穴。众人见此场面,又感动又吃惊,都赞叹范张二人的信义感动了上天。

范式诚信赴约、奔波千里为朋友下葬的故事在当时广为流传,山阳郡太守闻知后,遂上表奏请。汉明帝感其诚信,下令拨款在范式家乡山阳范庄修建庙宇,命名为“二贤祠”。“二贤祠”也叫“信义祠”“信义庙”。祠庙的建筑风格十分独特,不用脊椽,庙顶用两只平行的木椽支撑,象征着兄弟平等;墙体空心,里外行砖,象征着兄弟二人心心相印。庙顶的扁檐也是两根扣在一起,分别搭在前后庙墙之上,所有用料与设计都带有深刻而丰富的诚信内涵,这种建筑因此也被称为“无脊庙”。金乡的“无脊庙”建筑风格在国内外都十分罕见。范式家乡人民也把山阳范庄改名为“鸡黍”,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如今“二贤祠”屡毁屡修,只剩遗址。而在张劭的家乡河南汝南张庄,当地人建起鸡黍台供人凭吊,在张宅修建起“二贤祠”,供奉范式、张劭。同时改张庄为金乡铺,以示纪念。

范式把“信”和“义”作为朋友间相处的最高准则。范式的诚信之举,在金乡流传下了“鸡黍之约”的千古佳话,“鸡黍之约”也成为“诚信”的代名词。两千多年来,众多文献对范、张“鸡黍之约”的故事都作了描述与记载,赞颂了范张两位贤士的诚信精神。除了《后汉书·范式传》、《古今小说》《喻世明言》《清平山堂话本》等典籍外,佛家经典《金刚经》以及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也都详细介绍了“鸡黍之约”的故事。明代萧良有编撰的蒙学读物《龙文鞭影》中,也以“鸡黍张范,胶漆陈雷”故事教育儿童要讲诚信,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价值观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搜神记》、《山东通志》等诸多文献典籍,对“鸡黍之约”的故事也均有记载。我们常说的“八拜之交”,其中就有“鸡黍之交”,直指范式与张劭的君子之交。

【老照片】

爱读书的父亲

□郑八一

今年是先父郑又樵诞辰一百周年。屈指算来,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已有十七个年头了。每当我想念父亲的时候,常常会捧起过去的相册,翻看着父亲的老照片。他那慈祥和蔼的面容总使我心里涌动着一种暖流。

在我的书橱里,专门有两层用以珍藏父亲赠予我儿子的图书。虽然儿子成年后远赴外地求学、工作已十余载,但我仍将把这些书完好无损地保留至今。每当翻开这些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多彩的书藉时,我的目光总会停留在扉页上,一遍又一遍看着父亲用小狼

毫为外孙题写的赠言。见字如见面,父亲那一手清逸而透着筋骨的字迹,勾起的不仅是我对父亲学养的敬佩,更有一段段关于儿子成长过程中隔代亲的美好回忆。

儿子出生后,我总会利用寒暑假带儿子回家陪老人。记得儿子还没上小学时,就喜欢跑到父亲的书房里,站在堆积如山的群书旁,用好奇的眼神观察着,用稚嫩的小手去摸那些书。当他稍大时,又常喜欢问姥爷一些“为什么”,父亲总是耐心地一一解答,并说这些答案都能在书里找到。儿子读小学



后,父亲曾给外孙说:“姥爷一辈子最爱读书,也希望你能长大做一个爱读书的人。所以过春节不给你压岁钱,只送你书,书可以享用一辈子。”那几年,每当父亲赠予新书时,儿子总是兴奋不已,如获珍宝。一本《最新实用中国地图册》不知翻看了多少遍,激发了他长大要走遍祖国大好河山的

愿望;《影响中国的100本书》则为他打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熟读国史五千年》中的历史故事,使他熟知历史事件和古代人物……父亲习惯给儿子在新书的扉页上题赠赠言,如“以史为鉴”、“正蒙养而禅后学”等。这些赠言虽短,但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给予的启发、鼓励、鞭策却是深远的。